

多元文化輔導：亞洲文化的反思

葉錦成

香港理工大學

本文嘗試從現代西方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心理輔導模式的興起和有關觀念，去探討在亞洲文化中心心理輔導的應用。文章指出，亞洲傳統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有很多相異之處，而基於這些傳統文化依然對亞洲的民族和人民有深遠的影響，作者提出應以亞洲文化為主要的概念去發展和推動對亞洲國家及民族的心理輔導活動。面對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相互關係，應把傳統亞洲文化中有關心理輔導和助人的智慧發展起來，再結合西方相關的理論，建設以亞洲文化為主體的心理輔導理論和手法。

近年英、美各國都普遍認為，跨文化及多元文化的心理輔導是繼心理分析學派、以人道和存在主義為骨幹的心理輔導模式，以及行為認知心理輔導這三個浪潮之後的第四個浪潮(Cheatham, Ivey, Ivey, & Simek-Morgan, 1993)。這第四個浪潮的興起始於1970年代中期，當時學者開始質疑以英美文化為主(Eurocentric)的心理輔導模式並不適用於非英美文化的案主，尤以受非洲文化和亞洲文化影響的國家和族裔為甚(Draguns 1989; Jackson 1975; Pedersen 1985; Sue & Sue, 1990)。缺乏跨文化輔導意識的輔導員，在以西方輔導模式對非白人文化的案主進行輔導時，很容易把案主標籤為缺乏介入反應和不合作的案主(Pedersen, 1985; Pedersen, Fukuyama, Heath, 1989)。這些輔導員也會忽略案主本身特有的文化背景和環境(Sue, 1981; Sue & Sue, 1990)。事實上，近年

美國發生的黑人醒覺文化（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孕育了美國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輔導模式的出現。非洲的獨特文化對黑人的自我形象、自我權益，以及對美國境內種族歧視等等的醒覺，正正催生了多元文化和誇文化輔導的出現（Freire, 1972; Jackson 1975; White & Parham, 1990）。

除此之外，近年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急迫發展，正影響著跨文化和多元文化輔導的發展。這種發展正正引起了專業人士對西方輔導模式是否適用於亞洲文化的反省。作者希望透過本文與讀者一起探討近年跨文化輔導發展的一些爭論，並對亞洲文化中的實務進行反思。爭論的中心在於普遍性（universal）的取向和焦點（focused）的取向，前者注重文化的適性，後者注重文化的獨特性。本文不但檢討這兩種取向的特點，更指出不同文化中的交流與互動，希望藉此把西方文化與亞洲文化的通性與獨特性釐清，為多元文化心理輔導在亞洲尋找一條較合宜的出路。

跨文化及多元文化輔導的理論及爭論

跨文化及多元文化輔導的定義

跨文化輔導（cross-cultural counseling）及多元文化輔導（multicultural counseling）兩者在不同的理論中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含義相近（Draguns, 1996; Sue et al., 1998; Yan & Lam, 2000）。嚴格來說，跨文化輔導一詞出現較早，而多元文化輔導則嘗試把跨文化輔導的意義更進一步，希望能發展出一套適用於不同文化群體的輔導模式（Sue et al., 1998）。Draguns（1996）曾描述跨文化輔導的特質如下：

1. 改良西方輸入的輔導手法；
2. 考慮輔導過程中不同因素的複雜性；
3. 留意輔導時案主及輔導員兩者的文化背景對雙方溝通和表達的影響；
4. 明白案主的不滿和其他問題與有關病徵的情況；及
5. 將輔導工作者對不同文化的知識和經驗轉化成為有關技巧。（Draguns, 1996; Yan & Lam, 2000）

同時，Sue et al. (1998) 也為多元文化輔導作出下列描述。

1. 明白在個別文化情境中不同助人手法的形式；
2. 案主與工作人員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助人過程中的影響；
3. 輔導其實是由思想、行動、溝通、風俗、信念和價值觀在不同文化、宗教和社會群體的元素所組成；
4. 了解中西文化中助人過程的不同；及
5. 輔導員在輔導過程中對輔導信念、手法、知識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了解及掌握。

從上述定義和元素來看，跨文化和多元文化輔導其實可以在下列不同層次上進行反省：

1. 在多元文化國家中對不同文化族裔進行的心理輔導 (Lee & Greene, 1999; Sue et al., 1998; Uehara et al., 1996; Walker & Staton, 2000) ；
2. 案主與輔導員有不同文化背景時所進行的心理輔導；
3. 在不同文化背景進行的心理輔導，特別是指對西方輸入的心理輔導模式的本土反省，又或者是本土助人模式的理論創造和運用。

從這些不同的層次我們很容易看到，提倡跨文化輔導模式最初是由於輔導員與案主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輔導過程中，輔導員希望能把白人文化為主體的西方輔導模式應用在非白人文化為主的少數族裔案主身上。應用時輔導員只需稍加留意案主對問題的不同看法和反應，以及表達方式的不同就可以了。

然而，多元文化的輔導模式似乎比跨文化的模式更進一步，它把輔導員和案主不同文化差異的重心移放到案主的社會和文化環境和處境上。輔導員開始留意輔導手法、輔導技巧、輔導過程中的文化註釋和文化組成部分。換言之，在多元文化輔導中，輔導、輔導員、案主其實都成為了文化的一部分，即互相交流，也互相影響。

明白了這一點，下文再看看與跨文化和多元文化輔導有關的論述。

普遍看法與焦點看法的爭論

Cheatham et al. (1993) 認為，多元文化輔導在發展時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以文化共通 (transcultural) 為主的普遍看法 (universal orientation)，另一是以文化特色 (cultural specific) 為主的焦點看法 (focused orientation)。這兩種看法對多元文化輔導都有不同的理解。普遍看法的表表者首推 Fukuyama (1990)，他認為多元文化輔導的特色有：

1. 以較寬的層面去註釋文化特質，如性別、情緒取向、年齡、種族事件等等；
2. 留意輔導和治療過程出現的標籤作用；
3. 強調言語在輔導和治療過程中對溝通的重要性；
4. 鼓勵案主尊重自身的文化和家庭聯繫；
5. 討論兩性角色的問題；
6. 探討因文化差異而導致的文化相異 (acculturation) 和種族歧視；
7. 培養案主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和投入；
8. 替案主建立自信和自省；
9. 替案主建構其獨特的世界觀。

至於焦點看法，Locke (1990) 則認為應該把案主看成一個獨特的個體及差異文化群體中的成員，這種看法主要有三個特色：

1. 小心察看輔導員及案主對自己種族的看法及態度，並留意這些看法及態度對不同個體和群體的交互影響；
2. 在輔導和治療過程中討論有關種族和文化差異的問題，並對社會壓迫在個人和家庭層面作出反思；
3. 應同時視案主為個體和小組中的成員。

這兩種看法的差異主要在於：普遍看法認為文化差異的問題是共同的，只要把有關課題在輔導過程中不斷提出來討論便可；而焦點看法則注重對案主個人的深入了解。這種深入了解是基於輔導員對自己文化的深層醒覺，進而對不同文化體系的案主的了解和回應，對案主的文化處境有進一步的尊重和更深層而全面的了解，從而令輔導員自己的看法慢

慢移向案主的看法和觀點。Cheatham et al. (1993) 面對這種普遍看法和焦點看法的多元文化心理輔導的爭論，較傾向以後者的反省角度去看多元文化輔導理念和模型，並且更指出非白人的輔導員對自身文化的自我反省和認同是非常重要的。

這兩種看法一直在歐美國家多元文化輔導的理論建構中都有不少爭論，至今依然未有定論 (Draguns, 1989, 1996)。仔細去看，焦點看法傾向於注重個別文化群體的獨特性，如不同民族和國家的風俗習慣和語言等在輔導和溝通過程的影響；普遍看法則注重不同文化群體中的共通處，而這些既共通又不同之處正正令輔導員需要對案主的不同文化背景保持高度的觸覺和敏銳的回應。事實上在輔導過程中，輔導員和案主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輔導員要明白自己的背景、性格和看法都與案主有相同之處，這些相同之處可能來自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可能來自相同的宗教、相同的經歷，以及相同的處境和問題。同樣，不同的地方也可能來自不同的文化、經歷，以及不同的宗教和思想。輔導員應把握普遍相同之處，與案主進一步溝通和了解，藉以謀求改變。對於不同之處，輔導員除了要保持同理心和敏感度去虛心了解之外，更應透過觀察、閱讀、商談等，透徹地明白案主與自己不同之處的實質內容。例如，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輔導員在面對回教徒案主時實在應該：

1. 留心聆聽回教信仰的內容、想法和對案主的影響；
2. 找一些相關的書籍和人物，藉以更好地認識和明白回教信仰的詳細背景、派別、對各國民族的影響等；
3. 反思自己對有關信仰和想法有否偏見和誤解，而這些偏見和誤解在輔導過程中會否對案主產生不良影響。

根本化與本土化的爭論與看法

輔導的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在非英美國家中的發展非常重要，尤其對亞洲和非洲國家更甚，因為它們的文化背景與歐美國家在本質上有很大分別 (葉錦成, 2001a; Katz, 1985; Myers, 1988; Parham, 1990; Kitano & Maki, 1996; Yan & Lam, 2000; Yip, 2001)。透過本土化的過程，輔導員才能把西方的心理輔導模式慢慢地轉化成合用的本土實務。

在討論本土化的觀念時，Payne（1997）把本土化和根本化（*authentization*）分別出來。前者是指把西方的模式轉到本土應用；後者則是指從本土文化的傳統和根源中找出一向為該民族使用的助人自助方法，然後把這些方法慢慢透過理念的建構、研究和應用，變成有獨特文化背景的心理輔導（葉錦成，2002；Ho, 1998; Lee & Greene, 1999; Nimmagadda & Balgopal, 2001; Payne, 1997; Uehara et al., 1996; Walker & Staton, 2000; Walton & Abo El Nasr, 1988; Yip, in press）。Ho（1998）把本土心理學的本土化分為內向型的本土化（*endogenous indigenization*）及外向型的本土化（*exogenous indigenization*）。所謂內向型的本土化，其實就是從本體文化孕育出來的結晶，意思是指根本化的過程；而所謂外向型的本土化，則是指把外來的西方模式剪裁和調適而應用於本土上（Enriquez, 1992; Ho, 1998）。

仔細去看，根本化和本土化其實有很多地方相交和重疊，因為在本土化的過程中，本土的應用慢慢把本土的根本智慧和文化的結晶提煉出來，而在根本化的過程中，又會在建構本土理論時把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從而產生所謂的本土化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化與根本化的爭論對輔導員有下列的重要啟示：

1. 在輔導過程中所審察到的案主現狀，其實與案主的本土社會文化有關。
2. 案主的想法、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受案主的本土社會文化所影響。
3. 案主的本土社會文化，其實是案主所處身的社會的傳統文化與現代主流西方文化交互影響的結果。
4. 輔導員所建構的輔導關係和手法，應該與案主的本土社會文化有所聯繫。較接近案主本土社會文化所催生的輔導理論和手法，似乎較能令輔導員了解案主的需要和看法，也較容易令案主接納輔導並作出改變。
5. 除了西方現代社會所衍生的輔導模式和手法外，不同社會和文化背景的輔導員似乎該因應自己社會本土文化的背景和情況，孕育一套適用於本土文化的輔導模式和手法。

全球化對輔導的影響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不少國家（尤其是亞洲發展迅速的國家及城市）的生活形態、衣食住行、文化活動都深受科技文化和美國的影響（Drover, 2000; Midgley, 2000）。Drover（2000）認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出現了三種重要現象：主動的公民意識（active citizenship），跨國公民（extra-statist），和文化的多元影響（cultural diversity）。這三種現象對心理輔導的影響也頗為深遠。如今，輔導員面對的案主可能比以前的案主更注重自己應有的權利和想法。他們除了有本身民族文化的生活經驗外，也可能因為會到不同國家和城市旅行或生活而具備多國文化的生活經驗，於是他們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經驗便顯得非常多元化。在這種情況下，從事輔導及社會工作的從業員已經不能局限於「全球化思維，本土化行動」、「本土化思維，本土化行動」、「全球化思維，全球化行動」或「本土化思維，全球化行動」等模式中，而必須令思維和行動都同時具備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特色（both act & think locally and globally）（Life, 2000）。

換言之，輔導員在進行心理輔導時必須同時理解自身和案主的本體文化（mother culture），以及個別文化對全球化的看法和影響。此外，在提供問題的答案又或者引導案主改變和作出改善時，也必須明白這些改變在本體文化和全球化的影響和互動。Rowe, Hanley, Moreno, & Mould（2000）清楚指出，不同的文化群體其實對輔導和助人手法都有不同的理解，而這些不同的理解正因為全球經濟和社會活動頻密，以及人口移動急速而變得有所交流與互通，交流與互通的速度也愈來愈快，這對輔導手法的理念和果效都帶來深遠的影響。

爭論背後的反思及啓示

討論過跨文化與多元文化輔導、普遍看法與焦點看法、本土化與根本化的爭論，以及全球化對輔導的衝擊後，仔細想想，爭論背後為輔導員帶來下列的啓示：

輔導員面對的並非單一的文化體系和背景

大部分現行的輔導模式（如心理分析學派、認知行為學派、存在主

義學派所衍生的輔導模式和手法)，基本上都是孕育於西方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但上述有關的爭論卻非常清楚地顯示出，無論在多元文化背景的西方社會或是在亞洲文化的社會中實行輔導，輔導員面對的再不單是西方的文化背景和體系，所面對的挑戰包括：現代西方商業社會文化和不同國家、不同族裔的文化的混合；主流文化和案主自己獨特的傳統文化的結晶；輔導員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案主的文化背景的相遇。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正提醒輔導員在輔導過程中文化背景的複雜性和不同文化的相關性。文化系統的不同和相關性對輔導過程和手法起了複雜的影響，輔導員不可忽視，絕不能簡單地把西方的輔導手法硬套在不同處境、不同案主、不同問題上。

文化體系並非靜止，而是互為影響、互相交流

文化體系（如亞洲文化體系、西方文化體系、傳統亞洲文化體系、現代西方文化體系等）其實並不是靜止的，相反，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影響下是急速演化、互相交流、互相影響的。下文以香港本土文化為例來說明：

1. 香港本土文化是西方美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結合。
2. 本土文化不斷演變，1960年代香港的本土文化與1990年代的便有極多不同的地方。
3. 香港的案主中有些受西方文化影響較多，有些則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多。
4. 不少香港的案主都曾在西方國家讀書或居住，甚至曾移民外國；不同的體驗代表著不同文化體系的結合和註釋。

這些文化體系的演變，往往對輔導過程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譬如，一個香港中國族裔的輔導員在面對一個中國族裔的中年婦女訴說管教子女的問題時，輔導員可能要作以下的反省：

1. 案主管教子女的觀點和手法其實既有中國傳統管教子女方法的特色，也受現代西方社會管教子女方法的影響。
2. 案主身處的社會環境（即香港的處境）其實結合了現代西方商業社

會的生活節奏和傳統中國文化的衣食住行習慣。這些社會處境每天都在影響案主的家庭生活、親子關係和管教手法等等。

3. 案主的家人（如子女、丈夫、父母、親屬等）其實都不同程度地受中國傳統和現代西方社會文化影響，結果可能是大家對管教子女有不同的看法，而這些不同的看法正正可能是案主問題的癥結所在。
4. 案主的子女和家人可能曾經移民西方國家；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和管教方法也可能影響案主的看法、未來的打算、子女的反應等。

輔導員應不斷建構合乎當時社會文化的輔導手法

由於輔導過程、模式、手法深受文化的處境和複雜性所影響，所以不能只依賴西方文化的輔導手法，而應因應案主的本土文化和情景，又或是輔導員本身獨特的文化和情景，去建構合乎當時社會文化的輔導手法。這種新的嘗試，可以是對西方輔導模式本土應用新的註釋，也可以是西方輔導模式的改良，更可以是傳統文化中相關理念和方式的應用。

明白了這些文化的複雜性後，現在讓我們去看看亞洲文化和國家的回應和反思。

亞洲文化的回應與反思

亞洲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

亞洲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區，文化也相當深厚。雖然面對全球化的影響，亞洲地區的傳統文化如儒家思想、佛教思想、印度教思想和回教思想，依然影響深遠，主宰著大部分亞洲人的思想、行為和生活習慣（Abudabbeh, 1996; Ahmed, 1992; Almeida, 1996; Dwairy, 1998; Enriquez, 1992; Ho, 1995; Ho, Peng, Lai, & Chan, 2001; Naito & Gielen, 1992; Paranjpe, 1998）。這些孕育千年、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在本質上與現今的英美文化是有所不同的。

Nimmagadda & Cowger (1999) 認為印度教思想中的“Karma 因果”對現今的印度人依然影響深遠，Karma 令印度人明白今生會影響他生，亦即是今生受前生影響（Collins COBUILD, 1987, p. 790）。這種認命的

思想令印度人更容易面對苦難和貧窮，默默承受命運的安排和因果的定理（Nimmagadda & Cowger, 1999）。

與印度教思想相似的是佛教中前生、今生、來世的思想，這些思想也影響著中國人面對苦難、不安、貧窮的忍耐和認受（葉錦成，1999，2001a；Ho, 1998; Lin, Tseng, & Yeh, 1995）。除此之外，中國的道家思想一樣要求人在無為中超越自我，與無窮無盡的道成一體，不受世間事物和自己的感覺所束縛。中國人及華人也相信陰陽五行、風水、術數、面相等都靜靜地影響著每一個人的命運、成就和遭遇（楊中芳，1996；楊國樞，1989；葉錦成，1999，2001b；Lin, Tseng, & Yeh, 1995）。

回教主義國家中的人民大部分相信真神亞拉（Allah）和《可蘭經》（*The Qur'an*）主宰他們的命運。所有回教徒都必須遵從五種戒律：第一戒律是承認真神亞拉是唯一的真主；第二是每天祈禱五次；第三是要幫助窮人；第四是要在齋戒月（Ramadan）守齋；最後是要一生到麥加朝聖一次。《可蘭經》更為回教徒訂下各種道德和法律的規定，以及嚴格的家庭婚姻規條。在回教國家，一切法例、社會秩序和權力來源都在《可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論上（Almeida, 1996; Cooper, 1993; Dwairy, 1998）。

由此可見，亞洲的傳統文化如儒、道、佛、印度教和回教思想，依然深深影響著大部分亞洲人對生活、家庭、婚姻、壓力、苦難的註釋。這些亞洲傳統文化，不像現今英美社會認為個體應該奮力克服個人在社會和生活上的困難，而是認為個體大部分的苦難、壓力、生活和家庭上的問題，都由上天、道的定律、自然、前生、今生、因果、真神等等的安排和操縱，個體只能在這些極端的權威底下降服、接受和忍耐（Ahmed, 1992; Almeida, 1996; Cooper, 1993; Doi, 1973; Dwairy, 1998; Ho, 1998; Lebra, 1976; Nimmagadda & Cowger, 1999）。

現代的英美文化比較注重個人主義、個人能力的申張，以及個人發揮解決問題的能力。西方的心理輔導主要就是集中在這些個人能力的釋

放和彰顯。然而，亞洲文化卻似乎比較注重集體多於個人。在菲律賓文化中，“Kapwa”一詞就與英文中“Other 其他人”不同，英文中的“Other”是與“Self 自己”互相對立的。但菲律賓文中的“Kapwa”卻指個人與其他人的相互影響。同樣，在儒、道、佛和伊斯蘭教中的自我觀並不是完全獨立的自我演繹和註釋，而是由社會秩序、自然定律、因果、真神所界定及融和的自我（Ahmed, 1992; Almeida, 1996; Dwairy, 1998; Ho, 1995, 1998）。

在這裏，個體受集體影響最為明顯的莫過於亞洲文化中對家庭的重視。Yang（1995）認為華人社會有家庭／家族的取向（familial orientation），意思是指個人會為家庭及家族的光榮、團結、和諧、繁榮而作出犧牲，甚至把家庭和家族的需要放在自己需要之上。個人對自己的形象和想法，個體的思想、行為和情緒等，均深受家庭和家族成員所影響（Yang, 1995）。

這種家族取向不但常見於華人社會，在日本和韓國也非常普遍。日本語中“Amaeru”一詞指人與人之間交互影響的義務和責任（benevolence）（Doi, 1956; Ho, 1998）。日本人對群體、對家族和對其他人的承諾，責任往往以有如欠債這樣嚴格的態度去對待（Ho, 1998; Lebra, 1976, p. 91）。韓國學者 Choi, Kim, & Choi（1993）曾進行過一項韓國民族對“Woori 自己人”及“Cheong 情”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在自己人當中“Cheong”依然非常強烈，直接影響個體的思想行為（另見 Ho, 1998）。

在印度社會中，傳統的“Dharma 階級責任和規限”依然非常重要，個體必須明白自己身處“Caste 階級”的責任。Dharma 更清楚指示個人在家庭和家族中的權力、任務和責任。在印度教思想影響下，印度民族依然按這些傳統文化的規限，為自己行為的準繩、道德責任和自我形象作出註釋（Nimmagadda & Cowger, 1999）。

同樣，在亞洲回族和回教國家，群體和宗教的需要和規例依然凌駕於個體之上。個人的婚姻、家庭、性別角色、道德行為依然受族裔、家

族、回教思想所規限和影響。年紀小要跟從年紀大，女性要跟從男性，個人要跟從於宗族（Abudabbeh, 1996; Dwairy, 1998）。有趣的是，亞洲國家和民族雖然面對全球化、國際移民潮、科技和商貿的急速發展，依然能夠保留著濃厚和獨特的亞洲傳統文化，而這些傳統文化和思想也繼續深深地影響著個體的思想行為和看法。個體的婚姻、家庭觀、壓力、苦難、解決問題的取向等，依然受這些源遠流長的亞洲文化影響。

英美加為主與亞洲為主的心理輔導模式及取向

面對以英國、美國、加拿大為主的心理輔導大趨勢，在文化和處境均與這些國家有異的亞洲各國，實在有需要考慮建立一個以亞洲文化為主體的心理輔導模式和理念（Asia-centric counseling）。建立這個以亞洲為主體心理輔導模式，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正如上文所言，亞洲的傳統文化如印度教主義、儒佛道思想和回教主義，在自我、群體人生意義、家庭和面對人生苦難的層面上，都與現代英美文化有所分別。雖然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亞洲不少國家和城市的生活已日趨西化。但問題是，傳統亞洲文化依然影響深遠，主宰著個體的理念、行為和看法。因此，除了用本土化的模式去增減和改變英美的心理輔導模式外，實在有必要用根本化的概念去凝聚和建構從亞洲傳統文化演譯出來的心理輔導模式和手法。這樣，才能滿足亞洲民族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內在深層建構。心理輔導既然是面對人內心深處的心理、深層思維、感受和想法，這種取向無疑非常重要。

其次，現時盛行於世界的心理輔導手法，如心理分析、行為認知模式、精英治療、案主為主的模式和完形療法，實際上都是從英、美等國家的本質文化中慢慢演變出來。嚴格來說，它們是近百年來英國、德國、美國在根本化實務上的理論結晶。就算英、美近年發展出來的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心理輔導運動和模式，也都是把其他非英美文化族裔（尤其是非洲和亞洲文化族裔）放在多元文化國家中較次要的位置來看待（Draguns, 1989; Katz, 1985; Kitano & Maki, 1996; Myers, 1988; Parham, 1990; Sue, 1981; Sue & Sue, 1990）。況且，在心理輔導過程中，這些族裔的背景文化雖然與英、美、加拿大等國家的主體文化有異，但他們既然身

處這些國家，當然在某程度上要融入主體文化才能適應。因此，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心理輔導形式雖然注重文化上差異，但本質上仍然是以英美文化為主、亞洲和非洲文化為副的角度和取向（Draguns, 1989; Kitano & Maki, 1996）。若把這種看法和角度放在以亞洲傳統文化為主體的國家和城市，自然有本末倒置的感覺，因此以亞洲文化為主體的心理輔導運動實有必要。

最後，無法否認的是，不少文化源遠流長的亞洲國家如中國、印度、日本、阿拉伯等，傳統文化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和演變。在面對人生苦難的問題和壓力時，它們都有獨特的見解和看法。這些見解和看法不單對亞洲人有所裨益，對現代歐美世界各民族在面對生命和苦難時也有所啓發，例如不少英美學者已開始引入佛道思想在心理輔導中使用（Brandon, 1976; Eppsteiner, 1988; Jordan, 1985; Keefe, 1975; Koenig & Spano, 1998）。

因此，亞洲國家的心理輔導工作者應珍惜自己國家獨特而深厚的文化體系，發展傳統文化智慧中的有用的成分，使成為以亞洲文化為主的心理輔導模式（Almeide, 1996; Dwairy, 1998; Nanavathy, 1993; Nimmagadda & Cowger, 1999）。

實際上，非洲族裔的學者早已提出了以非英美文化為主體的心理輔導模式。他們不斷提出以非洲文化為主體的心理輔導和助人方法（Afrocentric counseling and social work），並且在英美國家引起不少爭論（Asante, 1987; Attneave, 1982; Jackson, 1975; Myers, 1988; Schiele, 1996; Shawky, 1972）。遺憾的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至為深遠的亞洲國家，卻仍未有這種醒覺。

提倡以亞洲文化為主的心理輔導模式，本質上並不排斥以英美文化為主的西方心理輔導方法。無可否認，以英美文化為主的心理輔導模式，基本上經過較嚴格的實務研究和理論探索，實用性非常高。提出以亞洲文化為主的心理輔導模式，目的是希望能與西方的心理輔導模式有所交流，有所借鑑，在對等、對衡的情況下能互補不足。事實上，在全

全球化的趨勢下，亞洲與歐美各國的文化交流活動已經日益頻密，心理輔導模式的交流和分享也愈來愈普遍。但假若沒有以亞洲文化為主的這種概念，所謂交流，也只會令得西方心理輔導模式對亞洲國家的影響愈來愈大，而對亞洲傳統文化的醒覺就變得稀少。雖然英美各國的多元文化和跨文化輔導模式也倡議注重亞洲傳統文化，但問題在於心理輔導員大多不是亞洲族裔，所以只能在文化敏感及文化普遍性的角度接納案主，而在輔導過程中卻不能就案主的背景文化作出深入的理解及溝通，更不能發揮亞洲族裔深厚文化中的輔導及助人手法和理念。要建立以亞洲文化為主體的心理輔導模式，主要責任依然落在亞洲國家的資深輔導員和學者身上。

就以中國文化傳統中有關心理輔導的智慧和手法為例，近年已有不少學者嘗試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老莊思想、傳教思想、氣功等融入輔導手法中，企圖建立一個有特色的、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心理輔導模式（吳彩雲，1996；崔玉華，1996；許又新，1996；曾文星，1996a，1996b；楊德森，1996；嚴和駿，1996）。

以亞洲文化為主的心理輔導取向的應用

明白了以亞洲文化為主的心理輔導取向的重要性之後，現在讓我們較仔細地看看在實行和建構時會遇到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

亞洲文化的複雜性和相關性

雖然亞洲國家文化體系與西方歐美國家文化體系的傳統有明顯的不同，但由於亞洲國家數目眾多，在文化和傳統上既有不同但又互有關連，因此輔導員在建構屬於自己亞洲國家文化的輔導理念和手法時，必須明白文化的複雜性和相關性。無奈的是，不少輔導員因受訓於西方文化體系的輔導模式，所以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往往多於對其他亞洲國家的認識。所以中國族裔的輔導員在建構屬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輔導模式時，必須明白這些輔導模式的局限性，並且可以參考其他亞洲國家相關的模式。

舉例來說，在香港使用氣功結合輔導和治療時，輔導員應該參考中國大陸氣功的應用和方法，也可以參考氣功在日本和韓國的不同應用，也可以看看印度文化中瑜珈的應用。這種多元的檢視不但令輔導員更明白香港人對氣功看法的局限，也可以明白東方文化中對氣功的不同使用和發展。這樣，才能令輔導員能較妥善地掌握亞洲文化的複雜性和相關性，從而有效地在輔導中運用出來。

亞洲文化的演變和與歐美文化的交流

如上所言，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影響下，亞洲國家的傳統文化不斷和西方國家的文化互相交流，加上不少亞洲國家的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深厚，輔導員在建構以亞洲文化為主的輔導模式時，必須明白這些文化的演變和交流，才能正確地建構和演繹出有關的模式和手法。以現代香港青少年流行文化為例，我們就可看到：

1. 西方歐美文化的影響（如：婚姻，性觀念，麥當勞文化）
2. 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如：飲食習慣，家庭關係，對權威的順從）
3. 日本文化和韓國文化的影響（如：韓劇和日劇中的戀愛觀）

這些亞洲文化的演變和交流，往往影響案主的觀念、對問題的看法和對輔導手法的反應。把這些演變和交流的原因建構於輔導模式中運用，才能有效地幫助案主改變。

面對亞洲文化的演變和與歐美文化體系的交流，輔導員要恰當掌握這些演變和交流並不容易。荷蘭學者 Hofstede（1991）就這些交流和演變提供了下列的層次和尺度供輔導員參考：

1.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與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2. 高權威距離（high power distance）與低權威距離（low power distance）；
3. 高不安逃避（high uncertainty avoidance）與低不安逃避（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4. 男性主義（masculinity）與女性主義（femininity）。

Draguns (1996) 更把這四個尺度運用在多元文化的輔導上。他認為歐美的文化體系比較傾向個人主義、低權威距離、低不安逃避和女性主義；亞洲的文化體系則較接近集體主義、高權威距離、高不安逃避和男性主義。不同國家的文化演變和與西方文化的交流，可能導致這數個尺度上的不同取向、定位和對輔導的適應性。例如 Draguns 指出，在個人主義為主的輔導中會著重案主個人的成長，處理個人的罪咎感、責任感、疏離感和衝突的應付；但在集體主義影響下，輔導的過程卻會側重處理人際關係、羞恥感、社會的融和。Draguns 的論說為提倡建構以亞洲文化為主導的心理輔導取向提供了一個與歐美文化交流和亞洲文化自身演變的基礎。

結語

總括來說，本文嘗試從現代西方多元文化和跨文化心理輔導模式的興起和有關觀念，去探討在亞洲文化中心心理輔導的應用。文章指出，亞洲傳統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有很多相異之處，而基於這些傳統文化依然對亞洲的民族和人民有深遠的影響，作者提出應以亞洲文化為主的概念去發展和推動對亞洲國家及民族的心理輔導活動。面對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相互關係，應把傳統亞洲文化中有關心理輔導和助人的智慧發展起來，再結合西方有關的理論，建設以亞洲文化為主體的心理輔導理論和手法。在建設這個以亞洲文化為主的心理輔導理論時，更應留意亞洲文化本身的複雜性和相關性，同時也應留意亞洲文化中的演變和與現代西方文化的交流，透過不斷的理論探索和深入研究，為亞洲文化的心理輔導模式和手法打下紮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 吳彩雲 (1996)。〈氣功：中國傳統的心理治療〉。載曾文星 (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頁 449-457)。台北：桂冠圖書。
- 崔玉華 (1996)。〈日本森田療法在中國施行的經驗與檢討〉。載曾文星 (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頁 635-654)。台北：桂冠圖書。
- 許又新 (1996)。〈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在心理治療中應用的可能性〉。載曾文星 (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頁 373-389)。台北：桂冠圖書。

- 曾文星（1996a）。〈文化、心理與治療〉。載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頁 1-26）。台北：桂冠圖書。
- 曾文星（主編）（1996b）。《華人的心理與治療》。台北：桂冠圖書。
- 楊中芳（1996）。《如何研究中國人》。台北：桂冠圖書。
- 楊國樞（主編）（1989）。《中國人的心理》。台北：桂冠圖書。
- 楊德森（1996）。〈中國人的心理與中國特色的心理治療〉。載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頁 417-435）。台北：桂冠圖書。
- 葉錦成（1999）。〈先秦儒、道、醫思想中的精神健康觀念〉。《亞洲輔導學報》，第 6 卷第 1 期，頁 35-55。
- 葉錦成（2001a）。〈香港社會工作本土化的沉思（一）：本土化的回顧與前瞻〉。《香港社會工作學報》，第 35 卷第 1 及 2 期，頁 51-78。
- 葉錦成（2001b，3 月）。〈從中西文化差異看心理輔導的本土化〉。文章發表於「華人心理輔導本土化研討會」，香港大學，香港。
- 葉錦成（2002）。〈中國古代道家的心理健康概念〉。《香港心理衛生會會刊》，第 31 卷第 1 期，頁 30-50。
- 嚴和駿（1996）。〈中國人的心理治療：從傳統觀念談到心理治療的發展〉。載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頁 437-448）。台北：桂冠圖書。
- Abudabbeh, N. (1996). Arab families. In M. McGoldrick, J. Giordano, & J. K. Pearce (Eds.), *Ethnicity and family therapy* (2nd ed., pp. 333-346).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Ahmed, R. A. (1992). Psychology in the Arab countries. In U. P. Gielen, L. L. Adler, & N. A. Milgran (Eds.),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50 yea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sychologists* (pp. 127-150). Amsterdam: Swets & Zeitlinger.
- Almeida, R. (1996). Hindu, Christian, and Muslim families. In M. McGoldrick, J. Giordano, & J. K. Pearce (Eds.), *Ethnicity and family therapy* (2nd ed., pp. 395-426).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Asante, M. K. (1987). *The Afrocentric idea*.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Attneave, C. L. (1982). American Indian and Alaska native families: Emigrants in their own homeland. In M. McGoldrick, J. K. Pearce, & J. Giordano

- (Eds.), *Ethnicity and family therapy* (pp. 55–83).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Brandon, D. (1976). *Zen in the art of help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heatham, H. E., Ivey, A. E., Ivey, M. B., & Simek-Morgan, L. (1993).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Chang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e field. In A. E. Ivey, M. B. Ivey, & L. Simek-Morgan (Eds.),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3rd ed., pp. 93–123).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Choi, S. C., Kim, U., & Choi, S. H. (1993). Indigenous analysis of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A Korean perspective. In U. Kim & J. W. Berry (Eds.),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Research and experience in cultural context* (pp. 193–210). Newbury Park, CA: Sage.
-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1987). London; Glasgow: Collins.
- Cooper, M. H. (1993). Muslims in America. *CQ Researcher*, 3(16), 361–384.
- Doi, T. (1956). Japanese language as an expression of Japanese psychology. *Western Speech*, 20(1), 90–96.
- Doi, T. (1973). Omote and ura: Concepts derived from the Japanese 2-fold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257(2), 258–261.
- Draguns, J. G. (1989). Dilemmas and choices in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The universal versus the culturally distinctive.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3rd ed., pp. 3–21). Honolulu, H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Draguns, J. G. (1996). Humanly universal and culturally distinctive: Charting the course of cultural counseling.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4th ed., pp. 1–2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rover, G. (2000). Redefining social citizenship in a global era. *Canadian Social Work*, 2(1, Special issue), 29–49.

- Dwairy, M. A. (1998).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The Arab-Palestinian case*.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 Enriquez, V. G. (1992). *From colonial to liberation psychology: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 Eppsteiner, F. (Ed.). (1988). *The path of compassion: Writings on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 Berkeley, CA: Parallax Press.
-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M. B. Ramos, Trans.).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 Fukuyama, M. A. (1990). Taking a universal approach to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30*(1), 6–17.
- Ho, D. Y. F. (1995). Selfhood and identity in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Hinduism: Contrasts with the West.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5*(2), 115–134.
- Ho, D. Y. F. (1998).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Asian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9*(1), 88–103.
- Ho, D. Y. F., Peng, S. Q., Lai A. C., & Chan, S. F. (2001). Indigenization and beyond: Methodological relationalism in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cross cultural tradi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9*(6), 925–953.
- Hofstede, G.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McGraw-Hill.
- Jackson, B. (1975). Black ident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iversity and Innovation, 2*(1), 14–25.
- Jordan, J. R. (1985). Paradox and polarity: The Tao of family therapy. *Family Process, 24*(2), 165–174.
- Katz, J. H. (1985). The sociopolitical nature of counseling.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3*(4), 615–624.
- Keefe, T. (1975). A Zen perspective on social casework. *Social Casework, 56*(3), 140–144.
- Kitano, H. H. L., & Maki, M. T. (1996). Continuity, change, and diversity: Counseling Asian Americans.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4th ed., pp. 124–14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oenig, T. L., & Spano, R. N. (1998). Taoism and 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E. R. Canda (Ed.),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New directions* (pp. 47–65).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 Lebra, T. S. (1976). *Japanese patterns of behavior*. Honolulu, H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Lee, M. Y., & Greene, G. J. (1999).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cross-cultural issues in teaching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5*(1), 21–37.
- Life, J. (2000). Localized need in a globalized economy: Bridging the gap with social work practice. *Canadian Social Work, 2*(1, Special issue), 50–62.
- Lin, T. Y., Tseng, W. S., & Yeh, E. K. (Eds.). (1995).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ocke, D. C. (1990). A not so provincial view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30*(1), 18–25.
- Midgley, J. (2000).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and social welfare. *Canadian Social Work, 2*(1, Special issue), 13–28.
- Myers, L. (1988). *Understanding an Afrocentric world view: Introduction to an optimal psychology*. Dubuque, IA: Kendall/Hunt.
- Naito, T., & Gielen, U. P. (1992). Tatemaie and honne: A study of moral relativism in Japanese culture. In U. P. Gielen, L. L. Adler, & N. A. Milgram (Eds.),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50 yea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sychologists* (pp. 161–172). Amsterdam: Swets & Zeitlinger.
- Nanavathy, M. C. (1993). Problem affecting the indigenisation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 in Asia. *The Indi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54*(3), 547–554.
- Nimmagadda, J., & Balgopal, P. R. (2001). Indigenisation of social work knowledge: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oces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10*(2), 4–18.
- Nimmagadda, J., & Cowger, C. D. (1999). Cross-cultural practice: Social worker ingenuity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practice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2*(3), 261–276.
- Paranjpe, A. C. (1998). *Self and identity in modern psychology and Indian thought*. New York: Plenum Press.

- Parham, T. (1990, July). *Do the right thing: Racial discussion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Conventions, Boston, U.S.
- Payne, M. (1997). *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 Pedersen, P. B. (Ed.). (1985).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Pedersen, P. B., Fukuyama, M. A., & Heath, A. (1989). Client, counselor and contextual variables in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3rd ed., pp. 23–52). Honolulu, HI: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Rowe, W., Hanley, J., Moreno, E. R., & Mould, J. (2000). Voices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International reflections on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Canadian Social Work*, 2(1, Special issue), 65–87.
- Schiele, J. H. (1996). Afrocentricity: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41(3), 284–294.
- Shawky, A. (1972).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15(1), 3–16.
- Sue, D. W. (1981).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fferent: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Sue, D. W., Carter, R. T., Casas, J. M., Fouad, N. A., Ivey, A. E., Jensen, M., LaFromboise, T., Manese, J. E., Ponterotto, J. G., & Nutall, E. V. (1998).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ue, D. W., & Sue D. (1990). *Barriers to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Uehara, E. S., Sohng, S. S. L., Bending, R. L., Seyfried, S., Richey, C. A., Morelli, P., Spencer, M., Ortega, D., Keenan, L., & Kanuha, V. (1996). Toward a values-based approach to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research. *Social Work*, 41(6), 613–621.
- Walker, R., & Staton, M. (2000). Multiculturalism in social work ethics.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6(3), 449–462.

- Walton, R. G., & Abo El Nasr, M. M. (1988). Indigenization and authentic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work in Egypt.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31*(2), 135–144.
- White, J. Y., & Parham, T. A. (1990). *The psychology of Blacks: An Afro-American perspective*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Yan, M. C., & Lam, C. M. (2000). Repositioning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3*(4), 481–493.
- Yang, K. S. (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Y. Lin, W. S. Tseng, & E. K. Yeh (Ed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pp. 19–39).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ip, K. S. (in press). Depowering the domination of empowerment model: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empowerment within Chinese culture. *Social Work*.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Reflections on Asian Cultures

This article tries to point out that traditional Asian cultures have a lot of differences from modern Western cultures. As these traditional Asian cultures still have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clients in Asian countries, counselors need to recapture all these profound traditional wisdom in counseling practice. By doing so, Westernized counseling models can be indigenized and intermingled with traditional Asian wisdom in the counseling process.